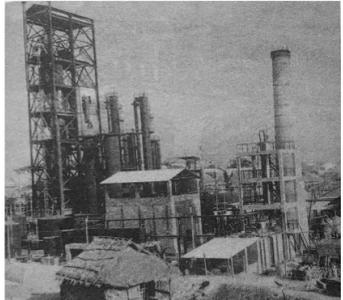


闪光的油城(一)

——茂名油城创业过程中的亮点

何炜明



茂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旧日废墟上开拓出来的一座工业新城,她伴随着国家社会发展成长,带着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烙印。茂名成长的历程,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复兴的一座历史丰碑,深刻地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、一往无前的精神。她具有松树的豪气,傲兀挺直,她呈现着寒梅的品格,暗香浮动;她更像神州芳圃中的一枝姹妍红杏,艳丽诱人。

她是国家建设起步年代的宠儿

茂名市建设的规划,始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“一五”时期。当时,为解决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之急需,由周恩来总理向苏联政府提出备忘录,请苏方为开发茂名南部盆地油页岩及生产人造石油提供矿山、炼油厂及其配套设施的设计和装备。这是“一五”时期,苏方援华建设“156项工程”之一。

茂名这个项目,含一系列建设子项目,堪与当时世界一流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(西德)最大的露天矿田比美。她建设的页岩干馏厂,用的是当时世界最先进于馏设备;她要建设的原油加工厂,在国内属于前所未有,是当时最新、最大的。该项目包括要建一座25万千瓦的热电站,向干馏炼油提供电能和蒸汽,还有为矿山和炼油厂服务(制造机械和修配)的中央机修厂。并且要从广西通过河唇镇引建一条约60千米的铁路,修建容20万人口生活的城市服务设施。此外,还有利用炼油生产的副产品配套设施,建设后续生产的化工厂。当年,这项工程曾被称赞为世界一流、中国一流、中南第一。主管中南工程管理的建筑工程部中南工程管理局,也整体从武汉转到了茂名,初称为茂名工程局,后因便于工作改称建筑工程部第四工程局。除肩负茂名建设工程外,仍兼管中南地区重点建设工程。

茂名开发建设,涉及十余个中央部委级单位,由两位副总理统筹,周恩来总理最后决策,计划投资总额超过14亿元。茂名页岩油开发关系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大局,曾专设有建设委员会,成立了总甲方,指定石油工业部一位副部长担任油公司领导,同时确定一位省委书记抓日常筹建工作。这是一项空前

重大夺油大会战工程,曾轰动一时。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黎廷楷,在工程建设前夕便深入茂名视察,建设开始后,全国政协委员、人民代表、著名作家巴金,著名学者高士其,甚至刚从美国回到国内的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,都先后莅临茂南现场视察。

茂名页岩开发建市,是冲破帝国主义恐怖乌云,在南中国海滨兴起的启明星

自鸦片战争以来,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和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,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,肆意凌辱宰割,百年来中华儿女浴血抗争,直至1949年把他们赶出了中国。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,侵略者仍贼心不死,一再扬言伺机发动侵华战争,欲把新兴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。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起步之时,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国内外反动势力,仍不断派出飞机和军舰到沿海地区骚扰破坏。国家建设的重大工程,在20世纪50年代多安置到西北、西南腹地。茂名页岩油开发建设本在“一五”时期已作出决定,但由于担心炼油厂建设遭到侵略者破坏,有人主张炼油厂建到广西柳州,也有人主张建到湖南郴州。直至1955年4月25日,毛泽东主席发表《论十大关系》讲话,指出帝国主义在短期内难以发动侵华战争,提出在沿海地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一些重工业的英明论断。当年4月28日,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发了在茂名建设炼油厂的批示文件。炼油厂建在茂名尘埃落定,茂名建市也就顺理成章。

可以认为:茂名建市是中国共产党人

粉碎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恫吓的一项历史性战略决策。茂名60年的发展,展示着中国人民不怕鬼、不信邪、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智慧和勇气。茂名市的出现,无疑似一颗在中国南海之滨兴起的启明星,指引着沿海地区人民前进的方向。

破釜沉舟,背水一战

茂名大规模的建设,始于“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“大跃进”年代。为了“与帝国主义抢时间、争速度”,1958年,全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。由于缺乏经验,人们热情可嘉,但科学建设战略思想不足,全国城乡项目遍地开花,但战线拉得过长。茂名建设大军进入现场,发现建设物资严重不足。当年的建设者以及当地的农民遂组织起来,挖煤烧砖,开发建筑材料,革新挖潜,劳动竞赛,节约代用,一机多用,各种办法都用了出来。虽然创造了诸多新经验、新办法,也涌现出许多新人、新事,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当时,从小东江以西的狭长地带到公馆圩边,从高山渡头到油甘窝,白天尘土飞扬,夜晚银花火树。南腔北调的劳动号子,此起彼伏,长臂高举,铁马轰鸣,一座2000平方米的办公楼,7天建成。今天尚兀立河西红旗路的“茂名饭店”,5000平方米四层半楼,50多天即在荒坡中矗立起来。然而,人的主观愿望难以抵挡天灾人祸,1959—1961年生活物资供应来源骤减,粮食一减再减,干部要节下粮食支援灾区,机关企业办农场,职工业余搞副业,种瓜菜来代粮,“无缝钢管”(通菜)挂帅……由于全国性灾害,兼统筹失

衡,中央不得不提出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方针和相关政策,缩短战线,压缩劳动力,减少城市人口。茂名在一再调整、压缩后,中央停止了投资,建筑工程系统撤离茂名,茂名页岩油投资也被斩断,茂名建设大军只剩三分之一,建设面临“下马”,人心浮动。“一垄葱胜过一个国家工。”有人说怪话,“干馏方炉,下层可养猪,二层当饭店,三层可做旅馆”,有人劝返乡,有人等待遣散,悲观情绪弥漫。当时从上到下,人们的目光都注视着茂名页岩油公司,是“上马”还是“下马”?还是继续干下去?市委常委会研究,苦于拿不出对策,决定让页岩油公司党委先研究方案。公司党委开了一个“马拉松”扩大大会(两段会,17天),会内外结合听取意见,上下反复议论,最后决定“又让又上”。在继续调整压缩的同时,集中尚未用完的资金“保加工”“建油库”,集中力量打歼灭战。公司领导向市委提出了“破釜沉舟,背水一战”的方案。市委同意后,该公司于1963年初,建成了首套常减压,完成了湛江油库建设。1963年第三季度该公司开始炼炼阿巴尼亚原油,这使其从1962年亏损超千万元的大户,一跃成为盈利139万元的盈余户。地方企业经调整、充实、提高后,保留的企业也都获得了生机。

茂名人名临危不惧,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,弘扬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气概,获得了中央支持。“上与下”“去与留”“死与活”的问题,终于获得了圆满解决。当年的拓荒一代人的意志、决心、毅力,以及他们的革命奋斗精神,将载入史册,永远激励后人奋发前进。

(本文原载《茂名故事》)

两代人情缘

霞海

翌日,珍将陈振丰的著作送到我手里。此书确如珍所说,堪称是播扬公社的百科全书。我仔细地阅读着每一章节,在“水利建设的样板工程”这章中,有一节专门介绍我父亲与村民一道,修建“三滩水坝”,解决农田干旱的详细记载。此段史实成为我书写父亲不可或缺的资料。

我母亲是位人民教师,生前曾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,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。各级新闻媒体有她大量优秀事迹报道。其中作者童牧写的一篇《她有一颗慈母心》,被《南方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,并加了编者按,号召广大老师向她学习,影响很大。我拟将此收入我们编著的怀念母亲的《雪梅飘香》。出于著作权考虑,必须联系到作者本人征求意见,但童牧是作者笔名还是真名,在哪里工作,我们一概不知。茫茫人海,到哪里寻觅?无奈之下,我们只得将此事托付给珍。珍果然不负众望,几经周折,多方打听,终于找到了作者本人。在珍的引荐下,我们得以与作者相见,最终如愿以偿。

因为书写父母,我们兄弟姐妹与珍之间的情谊愈发深厚。每次我从外地回

县城探望妹妹,珍夫妇都热情地请我们饮茶、吃饭,追忆父辈当年往事。我也礼尚往来,感情邀请珍夫妇到我工作地游玩。我们的情谊如同高山流水,悠长绵延。

去年暮春,我回到县城照顾年老的岳母,珍夫妇特邀我们兄弟姐妹到珍丈夫农村老家走一走,感受乡村振兴新貌。珍丈夫叫果,在县经信局工作,老家在黄槐村。果对我们说,黄槐村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老区村,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。怀揣着对先烈的崇敬,我们走进了这座英雄的村庄。

果深有感触地介绍,这里虽以农田为本,却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致富路。坡地上两千多亩荔枝林硕果累累,这是村民的“摇钱树”,每户仅此一项年收入便达七八万元。

一个盛夏的中午,我收到了珍夫妇从黄槐村寄来的两箱糯米糍荔枝。剥开那如凝脂般的果肉,甘甜的汁水瞬间浸润舌尖。这份清甜背后,浸透了老区人民日复一日辛勤劳作的味道,凝结了珍夫妇淳朴真挚的心意。唇齿留香间,父辈传承的情谊,随着荔枝蜜的清甜融入了我心底深处,日久弥新。

世人常说,友情是前世修来的缘分。但我更愿意相信,有一种情谊,是父辈精神的延续与传递,是两代人精神共鸣。我们兄弟姐妹与珍的深厚友情,正是承蒙父辈恩泽,在漫漫烟火生活中,相知相惜,终成莫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,我父亲与珍的父亲是同一个公社干部,我父亲分管农业生产,珍父亲分管党组织建设。两位父亲工作互相支持,配合默契。一同下乡,并肩劳动,汗洒田垄。午餐常在村民家里拌着咸菜,喝碗稀粥,吃个番薯,餐后给村民交上粮票和饭钱,从不占乡亲分毫。接着走家串户,体察民情,为村民排忧解难。长期农村摸爬滚打,让他俩成为亲密挚友。

那年父亲蹲点的大队修建水库,引水灌溉农田。父亲带领当地村民日夜在工地苦战,因劳动力不足,工程进展缓慢,眼看年关临近,春雨将至。珍父亲二话不说,动员全公社人党积极分子,组成突击队,在工地上大干十天,保证了水库按时完工。珍父亲常对我父亲说:“你管田,我管人,人种田,田养人!”此语虽似开玩笑,实为父辈们和谐共处的真实写照。两位父亲在工作中建立的深厚情谊,体现了在那个年代特有的担当与情怀。

珍是低我两届低我妹妹一届的高中同学。确切地说,珍与我算同学,应为校友。认识珍是她父亲带着她到我家作客。她来自农村,善良纯朴,

脸上透着被阳光晒后的暗红,身体微胖结实。

八十年代初,我父母亲从公社调入县城工作,珍父亲又带着珍到县城探望我父母,延续山水相隔的情谊。当时我和妹妹、弟弟都在外地读大学,留下很多高考复习资料,我妈就将这些资料赠送给珍,鼓励她继续高考。珍父女离开后,我妈发现还遗漏了一本书,马上骑着自行车赶往长途汽车站,在发车前将书交给了即将返回农村的珍。这份寄托着长辈的热忱和期盼,成为珍在未来奋斗岁月里一抹不灭的动力。

大学毕业,我和弟弟留在了外地工作,妹妹回到县城发展,珍也从公社调到县城工作,妹妹与珍交往又频繁起来。

2015年夏,为了写一本怀念已故父亲的书,在妹妹安排下,我见到了四十多年未曾谋面的珍。她已没有了昔日的微胖,人显得清瘦干练、儒雅大方,在县档案局工作,对全县历史资料熟悉。珍对我说,茂名市海洋与渔业局陈振丰,是播扬公社人,在播扬公社工作过,与您父亲曾是同事,人称他为“播扬通”,他著有一本书《播扬风采》,可能对您书写父亲历史有参考价值。

地往后退,殊不知退到了深水区,瞬间便没顶了。

肥仔德在水中挣扎,我们五六个人见了,大惊失色,不知如何是好。我急中生智,飞跑上江堤大声呼喊:“救命啊——救命啊——有人掉落水啦——!”

幸好,不远处有个老伯陈钦正在田中查看水稻,闻声飞跑过来,跑到江堤时,连衣服也顾不得脱,一头扑进水里,将正在挣扎的肥仔德抱起,再急急走上岸来。然后双腿跪在沙滩上,将肥仔德横放在他的双腿上,背朝上脸朝下,不停地拍打肥仔德的脊背。不一会儿肥仔德便吐出几口水,然后“哇”的一声哭了,慢慢睁开了双眼。家钦伯公松了一口气,轻轻说了句“没事了。”然后严肃地对我们教育了一番,说以后千万要小心,谨记莫往深水处走,这次肥仔德就是个教训。我们齐刷刷地站在沙滩上,神情肃穆,目光专注,看着家钦伯公的说话。说

陈冲

完,他弯下腰,轻轻摸了摸肥仔德的头走了,身上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事后听说他身上的一包“熟烟”和一盒火柴,全都湿透报废了。我们随后在沙滩上穿上衣服,又像往常一样,说说笑笑吱吱喳喳往村里走,好像刚才压根儿没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儿。

光阴荏苒,岁月如梭。不觉之间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肥仔德借着改革开放之机,到深圳“闯世界”去了。几经拼搏,历经艰辛,肥仔德成为建筑商(俗称“包工头”),搞得风生水起,成了村中的首富,正应了那句古语“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”。肥仔德是有钱人了,“大哥大”不离手(其时是有钱人的标志),出入小汽车(俗称屁股冒烟),风光无限,成了村中人人称赞、个个羡慕的老板。

肥仔德没有忘记当年救他上岸的家钦伯公,也没有忘记当年跑上江堤大喊“救命”的我。发达后第一次衣锦还乡,

便给家钦伯公送去一台大彩电,也给我送了一台。但我哪能领呢,当初跑上江堤的呼喊,纯是友善的本能,朋友的义务,换谁都会这样。理所当然的事,何足挂齿?算不得什么功,算不得什么劳,我坚不肯收。肥仔德生气了,说:“陈冲,你如果不收,就是看不起我,以后我们再不是什么朋友了!”旁边的乡邻也说:“收下吧,一台电视机对于阿德老板来说,连‘九牛一毛’都不算!‘湿湿碎碎’。”此时,肥仔德的两名下,早把电视机抬到我家门前。此情此景,正是盛情难却,唯有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此事,在全公社成了头条新闻,熟悉我的人,见了面总爱打趣道:“陈冲,当年你那一声喊,值钱哪!”是啊,当年一台大彩电,价值超万元。但肥仔德却说“值钱!”这也说明了肥仔德的美德——知恩图报。也许,这正是肥仔德做人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我的从政经历: 十四年沉重的接力棒

陈德文

1994年的中国乡镇,像一列沉重的火车,正沿着“发展”的轨轨艰难启动。这年,我从化州市那务镇中心小学教导主任调任那务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,从“孩子王”到“土头王”,笔尖划过纸面,沙沙作响,如同时代车轮碾过乡土的沉吟。这列车上,载着计划生育的国策重负、公粮征收的千年惯性、公路大会战的风尘仆仆,以及乡镇企业的朦胧曙光。而我,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,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旋转。

我的办公室,是乡土中国最敏感的神经末梢。在这里,“国策”不是文件上冰冷的铅字,而是东村阿婆为保住孙儿彻夜的哭泣,是西村汉子因抗拒征粮而涨红的脸膛。我谋划的,是今晚如何让计生工作队既完成任务又不激化矛盾;我组织的,是明日如何让村民理解一条公路将怎样撬动封闭的命运;我推动的,是那些蹒跚学步的乡镇企业,如何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寻一口生机。甜,是看到第一条村级公路通车时,乡亲们眼中浑浊的泪光;酸,是面对家徒四壁的超生户时,政策与人情那撕扯灵魂的拉锯;苦,是无数个通宵达旦后,独自吞咽的冷馒头;辣,是处理突发冲突时,扑面而来的指责与不解。这沉甸甸的“接力棒”,每一道纹理,都浸透着基层最真实、最粗砺的汗与泪。

五年后,调令将我抛向一个边缘的山区水果镇——兰山镇。身份从“中枢协调者”变为“一线指挥员”。放下计划生育的棘手名单,我捧起了沾着泥土的香蕉苗、荔枝枝。在这里,“发展”有了更具体的面容:是蕉农为防治黄叶病紧锁的眉头,是荔枝面对“大小年”收成时的忧喜交加,是红杨桃挂果时那一片令人醉的绯红。我的战场,从办公室和会议室,转移到了田埂、果园、农技推广站。我与农民一同计算成本,一同担忧风雨,一同期盼市场价格。我忽然明白,此前我手中那根“接力棒”的重量,源头正在这里——在每一寸渴望富饶的土地上,在每一双布满老茧,却试图握住命运的手中。基层工作的真谛,从来不是简单中“传递”与“执行”,而是先要将自己的根须,深深扎进这泥土里,去感受大地的脉搏与温度。

当新世纪的阳光普照,2000年后,我先后被调任化州市委党校与茂名市委政策研究室、市委政法委。空间从田间地头转向课堂与案头,视角从“一镇一事”拉升到一市一城的宏观脉络。在党校,我试图将那些滚烫的泥土经验,淬炼成可供分享的思想;在政策研究室,我学着用“城市经济”的框架,去解读我曾亲历的乡镇躁动;在政法委,我研究“平安建设”,脑中浮现的却是当年因征地、计生而起的纷争面孔。这是一次奇妙的“回溯”与“升华”。我像一位地质学家,反复端详自己从基层带来的“岩石样本”——那些具体的矛盾、鲜活的悲欢、刻骨的体验,在理论与政策的放大镜下,逐渐显现出它们在中国现代化巨大地层中的位置与意义。手中的“接力棒”,似乎变轻了,因为它已内化为我观察与思考的骨骼;却又似乎更重了,因为它此刻承载的,是对这片土地上无数人命运更深刻的理解与责任。

十四年,不过历史一瞬,于个人却是半生。这根“接力棒”从实体到抽象,从责任到信仰,完成了它在我生命中的“中国式成长”。它让我懂得,真正的成长,绝非权力的递进或岗位的变迁,而是视角的打通——打通政策条文与百姓炊烟,打通宏大叙事与个体冷暖,打通执行者的“身人”与思考者的“心至”。这根棒子上,刻满了“中国密码”:它一头连着中央“治国理政”的顶层设计,另一头必须深深插入“基层治理”的复杂地气;它既需要“大会战”式的雷霆推动,更离不开“水果种植”般的耐心培育。

如今,回望来路,百感交集。那务镇的晨雾、水果镇的果园、党校的讲台、研究室的孤灯……一幕幕掠过眼前。所有的甜酸苦辣,最终都沉淀为一种复杂的宁静。我交出的,或许并非一份辉煌的答卷;但我握过的,是一段无比真实、充满张力、值得反复咀嚼的“中国历程”。这根“接力棒”仍在传递,而我有幸,曾用十四年的青春与心血,感受过它的重量与温度,并在其上,留下了属于一个粤西年青干部,微小却真诚的指纹。

这,便足够了。前方的路还长,鉴江水静静流淌,见证着这片土地上,无数类似的故事,仍在无声地发生、延续、成长。每一个接过接力棒的人,都将在这伟大的征程中,刻下自己独特的年轮。